

税收激励、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持续性创新研究综述

一、企业持续性创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企业持续性创新概念与测度

持续性创新理论的发展历程，折射出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范式的演进。作为创新理论的奠基者，熊彼特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创新周期理论，揭示了企业创新的间断性特征，认为企业家通常在产业变革关键节点集中实施创新，而在稳定期趋于保守（Schumpeter, 1934）。这一理论在 1942 年得到重要修正，熊彼特发现垄断企业可通过技术轨道转换突破创新瓶颈，为后续持续性创新的深入研究埋下理论伏笔（Schumpeter, 1942）。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制造业的崛起，催生了持续改进思想，该思想将微观层面的质量提升机制与宏观产业竞争力相关联，为持续性创新研究提供了实践样本。Nonaka（1991）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持续创新理论框架，首次将持续性创新定位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能力，标志着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突破。其后，欧盟资助的“21 世纪持续性技术创新政策研究”（POSTI, 1999-2001）项目，提出两种持续性创新定义，一是基于经济管理视角，对持续创新的定义主要源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新过程或者产出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关注创新效益的长期积累；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持续创新概念则注重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源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突出生态价值但弱化时间维度。由此，企业持续创新研究分化为两个方向，本文采用经济管理视角下持续创新的定义，将第二种定义归类为可持续创新或绿色创新。

在持续性创新的概念界定方面，学术界逐渐形成两大并行互补的视角，即时间序列视角与组织过程视角。一是基于时间序列视角，核心是将持续性创新定义为创新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与积累，强调创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前后关联、不断积累的动态序列。Aghion 和 Howitt（1990）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这一思想基础，明确指出后续的创新活动必须建立在之前创新的知识基础之上，揭示了创新活动的路径依赖特性。Geroski et al.（1997）从企业行为层面给出操作性定义，将持续性创新界定为企业持续从事创新活动的时间段，且创新持续性水平与这一时间窗口的长度正相关。这一观点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Malerba 和 Orsenigo

(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在第 t 年有创新活动,会显著提升其第 $t+1$ 年继续进行创新的概率,体现出创新行为的自我强化与状态依赖特征; Clausen et al. (2012)进一步证实,企业过去的创新经验能够形成组织记忆和知识库,显著提高其未来开展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与成功率; Diana (2014)总结指出,持续性创新本质上是过去创新与当前创新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是一个企业对过往创新成果进行反馈、学习和积累的循环过程。基于这一视角, Bas et al. (2011)甚至发展出基于多个相同时间段内企业创新行为模式的分类学方法,将对持续性的测量应用于企业类型的划分。

二是基于组织过程视角,这一视角不再局限于创新连续的时间表象,而是深入剖析创新持续的内在机理,强调要素协调、能力构建与系统互动在维系创新流中的核心作用。该流派的奠基性工作来自 Teece 和 Pisano (1997),他们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将持续性创新定义为企业快速进行产品创新,并有效协调与重构内外部资源管理的能力,将持续性从一种结果状态提升为一种稀缺的组织能力。国内学者向刚 (2005)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化拓展,明确辨析了持续创新与可持续创新的概念差异,提出整合性定义,企业持续创新是企业通过不断更新和实施多维度的创新活动,并获得经济、科技等方面效益的长期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向刚和刘昱 (2005)构建了企业持续创新的要素体系框架,将创新过程解构为四个关键维度,分别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驱动力,以人力资源与资金为内部基础支撑,以创新项目为实践载体,并以制度环境与技术生态为外部保障系统。这一框架深刻揭示了持续性创新是一个涉及主体、资源、活动与环境的复杂系统工程,其生命力源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同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匹配。国际学界对该视角的研究也不不断深化, Crespi 和 Scellato (2014)将企业层面的创新持续性溯源到熊彼特的产业动态观,认为技术变革是知识和技术渐进性积累的必然结果; Diéguez-Soto et al. (2016)则强调,持续性创新是研发与创新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企业持续改革、组织学习与突破性创新之间持续的互动与融合。这种以能力为基础的持续性创新,使企业能够作为一种动态有机体,持续洞察内外部环境变化 (Batra et al., 2018),应对复杂性挑战 (Bianchini and Pellegrino, 2019),进而构筑起持久的竞争优势与创新绩效 (Clausen et al., 2012)。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从更多元视角拓展了持续性创新的内涵。Boer 和 Gertsen (2003)构建改进、学习、创新动态循环体系,揭示了组织通过内部学习将改进活动转化为持续创新能力的核心机制; Clausen et al. (2012)引入技术

路径依赖概念，指出企业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产品迭代与工艺优化所形成的技术积累，不仅提供资源基础，更形成创新惯性，助力企业在既有技术轨道上把握新机遇。

相较于国际学界，国内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系统性研究虽起步稍晚，但已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成果。在向刚教授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国内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视角。李健等（2016）从财务视角出发，将持续性创新理解为企业创新活动的持续投资，突出其资源依赖特征，强调其概念的投入特征；何郁冰等（2017）则基于战略与经济学视角，提出二元分析框架，认为企业持续创新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包括在现有技术轨道上的挖潜式创新和面向未来的探索式创新，两者都依赖于组织通过持续学习进行知识创造与转化的核心能力。贾建林（2019）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探讨技术创新的延续性，指出企业既有的技术储备与研发经验，会通过知识溢出和路径依赖，为未来创新提供基础条件与发展动能，从动态演化视角深化了对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实证测量方面，余芬等（2021）另辟蹊径，将持续性创新定义为一种创新流，重点关注创新产出的连续性，提出企业专利产出中断时间越短，创新持续性越高，并采用生存分析法进行度量，为量化研究提供了新工具。

综上所述，企业持续性创新的概念已从单纯描述创新时间分布的指标，演变为融合时间动态性、组织能力、系统要素与战略意图的复杂理论构念。本文对其界定如下，持续性创新是指企业作为动态有机体，通过在时间维度上连续且积累地开展创新活动，并在组织内部系统地协调要素、构建动态能力，形成的自我强化型的状态依赖与发展过程。它不仅关注单一时点的创新绩效，更强调创新行为在时间上的连贯性、节奏上的稳定性与发展路径上的可持续性。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企业适应环境变化、跨越技术生命周期，构建起长期竞争优势。

企业创新持续性的量化研究主要围绕测量维度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展开。在测量维度方面，学术界主要采用三类核心指标：研发投入强度、创新产出成果以及综合性的 CIS 调查数据。研发投入维度方面，多项跨国研究证实了其作为持续性代理指标的有效性。Crépon 和 Duguet（1997）采用研发资本投入指标，验证了制造业创新活动的持续特征。Triguero 和 Corcoles（2013）对西班牙企业的分析，延续了这一测量思路。创新产出测量则呈现多元化特征，早期研究（Flaig and Stadler, 1994）聚焦工艺与产品创新，而后续学者更倾向采用专利数据作为标准化测量工具，Cefis 和 Orsenigo（2001）、何郁冰等（2017）均证实，专利数量能

有效反映创新产出的时间序列特征。为克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部分学者引入综合指标体系，Peters（2009）的对德国企业的研究，采用包含研发投入与产出的欧洲共同体创新调查数据（EC innovation survey，简称 CIS），为创新持续性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观测维度。

在方法论方面，学术界形成了多元化体系，转移概率矩阵（Cefis and Orsenigo, 2001；Tavassoli and Karlsson, 2015）、Probit 模型（Triguero and Corcoles, 2013；苏桔芳等，2016）以及 Tobit 模型（Peters, 2009；Huang and Yang, 2010）构成了主流分析框架，主要通过考察企业创新活动的时滞效应来评估持续性特征。但该范式存在明显局限，难以捕捉创新活动的动态累积效应。针对这一缺陷，何郁冰等（2017）构建了基于创新产出的新型测量体系，采用相邻年度专利数量或研发投入的环比增长率作为核心指标。该方法论创新得到后续研究广泛认可，余芬和樊霞（2020）、樊霞等（2020）的实证研究，均验证了该测量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其更能准确反映创新活动的时序特征和累积效应，为持续性研究提供了更精确的分析工具。

（二）企业持续性创新经济效益

在全球化竞争与技术迭代加速的背景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持续性创新能够为企业创造显著且多元的经济效益。Carl 和 George（1998）指出，企业须构建动态创新机制，通过产品服务创新和战略调适以应对市场变化。这一观点得到广泛实证支持，Koellinger（2008）验证了创新持续性对企业财务指标的正向提升效应；Antonelli（1997）揭示了创新积累在企业技术壁垒构建中的核心作用；Triguero 和 Corcoles（2013）基于西班牙制造业数据证实了研发投入的乘数效应；Tavassoli 和 Karlsson（2015）以瑞典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不同类型创新的持续性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产品创新的路径依赖性最强且持续性水平最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Guarascio 和 Tamagni（2019）的研究对传统理论形成挑战，其实证结果表明，创新持续性与企业市场绩效之间未必存在必然关联，这一发现为创新价值实现机制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持续性创新通过多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绩效，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维度。在企业财务绩效方面，Cefis et al.（2005）证实，持续性创新可通过降低企业边际成本，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Triguero 和 Corcoles（2013）结合西班牙制造业企业动态发展特征，研究发现持续创新企业相较于间歇创新企业，能够实现更高的销售增长率；许治等（2020）以托宾 Q 值衡量企业绩效，证实企业技术持续性创

新与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且该关系会随市场波动程度加剧而更为显著。在生产效率与成长性方面，Leonid（2017）验证了持续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联；姚珊珊和段海艳（2023）基于生存分析法，证实持续性创新可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商业化绩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企业生存与稳定发展层面，贺小刚等（2023）认为，持续性创新能力是困境企业实现复苏的关键支撑；Aboody 和 Lev（1998）验证了持续性创新对股票溢价的正向影响；李德辉和潘丽君（2022）通过研究企业事件史，发现持续创新能力是新创科技企业提升生存率的核心要素；Parrao et al.（2025）研究表明，规模较小且创新持续性较高的企业，其就业水平显著高于创新持续性水平较低的企业。

（三）企业持续性创新影响因素

现有关于持续性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展开，其中，内部因素可进一步划分为技术层面、组织内部因素以及个人能力三个方面。

（1）内部影响因素

一是技术层面因素。影响企业持续创新的技术要素可划分为内部技术能力与技术协同能力两个维度。内部技术能力具体体现为技术领导地位、技术多元化与管理技术专业化等。根据 Fontana 和 Vezzulli（2016）的研究表明，技术领导型企业相较于追随者更易实现持续创新，其产品市场适应性更强。何郁冰和张思（2017）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提出技术创新实质是企业通过知识库持续更新实现解决方案迭代的学习过程，而技术多元化可促进跨领域知识协同，产生规模收益递增效应，驱动企业持续创新，管理技术专业化同样是重要支撑。Diéguez-Soto et al.（2016）研究发现，在家族企业等追求长期发展的组织中，专业化管理技术能够通过推动产品与流程创新，提升创新持续性。

技术协同能力源于组织与环境层面技术资源的协同整合，主要体现在技术联盟、技术并购与技术整合等机制中。吴琨等（2012）指出，技术联盟借助合作学习、研发整合与成果市场化等机制，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支撑。类似地，余芬等（2021）证实，技术并购作为知识转移重要手段，对创新持续性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赵炎等（2023）进一步揭示，技术整合能力与企业持续创新之间呈倒 U 型关系，适度的整合能力最能促进创新可持续发展。

二是组织内部要素。组织结构、企业特征、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管理及营销创新等，是影响企业持续创新的关键组织因素。在战略治理层面，持续创新需要

适配的组织架构与治理机制作为保障。乐怡婷等（2017）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发现，高管持股通过缓解委托代理冲突形成长期激励效应，显著促进创新持续性，但高管过度自信会弱化该正向关系，且这一调节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徐炜等（2025）研究表明，国资参股与家族企业创新持续性呈倒 U 型关系，其影响强度受家族控制结构类型调节。

在企业特征层面，孙冰等（2024）以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发现企业规模与持续创新呈倒 U 型非线性关系，与先前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差异。在研发投入与知识积累方面，何熙琼和杨昌安（2019）引入成本分析视角，证实沉没成本效应和政策环境共同影响创新持续性，成本粘性特征越显著的企业，创新投入延续性也越强；Angela et al.（2014）通过面板数据证实，高技术机遇、专利积累、经验学习、持续研发投入及科研机构知识支持，均显著提升创新持续性；Martini et al.（2013）对意大利制造业的研究表明，研发导向的创新活动具有更强的持续性。Bas et al.（2011）基于卢森堡创新调查数据，指出组织创新是决定持续创新的核心要素，高研发强度企业更易形成持续创新模式。

在人力资源与市场维度，Chowhan et al.（2017）研究发现，通过提升员工素质、技能与工作动机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激活企业创新要素、增强创新韧性；Lhuillery（2014）强调，营销创新对创新连续性具有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在高科技产业中尤为突出；段海艳（2017）基于 1985-2015 年 1921 家上市公司专利数据，采用持续专利时间、数量等指标测度持续创新，发现公司规模显著促进持续创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创新持续时间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仅对专利时间有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效果显著但股权激励作用未充分发挥，盈利能力与债权融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陶瑞等（2011）提出的“火箭模型”，形象描述了创新要素协同机制，指出企业家为核心驱动力，内外部资源为推进系统，创新文化为侧翼支持，共同推动持续性创新实现。

三是个人能力因素。员工能力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特质，对企业持续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Soosay 和 Hyland（2005）的研究表明，员工的个人能力与领导力是推动组织持续创新的关键要素，具体体现在学习能力、有效沟通、创造性思维、授权管理、团队协作、灵活应变以及适应变革等多方面，这些能力有助于强化组织整体创新行为与协同机制。在能力传导机制上，创新驱动动力通常呈现自上而下的路径，即从领导层逐级辐射至基层团队。作为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者与推动者，高层领导者对持续创新活动具有核心影响。相关长期创新计划需通过

高层与团队的共同协商确立，而高效的领导团队能够系统响应技术、组织与流程等多层面的创新需求。进一步研究也表明，企业家精神作为高层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持续增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韧性。正如旷锦云和程启智（2010）指出，缺乏企业家精神将制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周路路等（2017）从心理学视角出发，通过运用经典的消费加速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与组织持续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联，具体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适度的高管自信心理有助于推动创新决策，但当自信程度超过临界值后，反而会对企业的持续性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在新兴组织形态中，平台型领导通过整合领导者、员工与平台资源，形成协同发展机制，持续获取高质量资源，进而有效提升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梁阜等，2023）。余芬和樊霞（2022）依托高阶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方法量化高管认知水平和认知独特性，通过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管技术创新认知水平与认知独特性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综上，个人能力因素从多个层次、多重机制推动企业持续创新。

（2）外部环境影响因素

在企业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中，外部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影响维度。其中，市场环境 with 政策环境作为两大核心要素，通过外部资源整合、伙伴协同关系与创新政策支持等机制，共同塑造企业创新轨迹与发展路径。市场环境因素中，高水平的外部资源整合是推动持续创新的重要基础。研究表明，与客户、供应商及科研机构建立深度整合关系，能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关键支撑（Carrillo-Hermosilla et al., 2010）。同时，当地社区、中介机构及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也有助于增强创新的可行性和创新成果的社会接受度（Achterkamp and Vos, 2006）。除传统合作伙伴外，持续创新还需吸纳跨领域专业知识人才，并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企业普遍积累了一定的开放创新经验，但持续创新管理仍面临独特挑战。Arnold（2017）研究证实，与外部伙伴的密切合作虽有利于产品与服务创新，但需在资源投入与创新组合风险之间进行平衡。因此，能够系统构建并管理多元合作网络的企业，更易从协同效应中获得持续创新优势（Rauter et al., 2019）。考虑到数字经济对于企业构建创新开放网络的重要性，杜金柱和扈文秀（202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实证发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持续性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政策环境方面，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与多元支持手段积极促进企业创新，但其影响机制与长期效果呈现出一定复杂性。李健等（2016）的研究揭示了政府补助与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交互影响机制，该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政府补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提升创新持续性，但股权集中度会削弱这种正向效应，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更为明显。余芬等（2021）则基于创新动机视角检验了政府补贴对实质性创新企业和策略性创新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侯林岐等（2024）以绿色创新为切入点，发现政府绿色采购能够通过改善高管绿色创新认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预期市场回报率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相较之下，更有效的政策方向是构建多层次创新支持体系，通过培育创新文化与完善制度环境，全面激发企业的持续创新活力（Nam and Bao, 2021; Acemoglu et al., 2018）。叶云岭等（2025）从外部制度因素入手，创新性地构建制度、知识流、创新这一传导机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得出知识产权政策通过降低技术交易成本路径正向促进企业持续创新。然而，也有研究认为部分政策对企业创新不存在长期效力。韩凤芹等（2020）研究了选择性税收激励对于企业创新的长期动态影响，他们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入手，检验得出选择性税收激励虽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企业创新产出，但是该税收激励的作用仅在短期内显著，不具有长期效应。由此可得，政府政策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工具差异、情境依赖与时效边界。

现有研究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战略规划、公司治理、政府政策以及制度环境等内外部多维因素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近年来，随着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化，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拓展，将持续性创新置于数字经济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政府环保关注等时代背景下（杨茜等，2025；周涛等，2025；姚正海和王强，2025）。例如，崔丽等（2024）在研究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 U 形关系时，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影响创新持续性投入，从而作用于创新绩效。胡冰和戚聿东（2025）则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姚正海和王强（2025）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碳达峰碳中和等理念研究发现，企业的 ESG 表现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纠正投融资期限错配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产出，另外，长期股权激励可以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周泽将和高雅萍（2024）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关注度对企业绿色

持续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其中源头管控绿色持续创新的政策效果显著高于末端治理绿色持续创新。这一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其作用路径主要体现为，一是通过财政补贴、技术转移等资源补偿渠道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二是借助政策信号传递形成认知强化效应，使企业管理层环保意识提升。

二、税收激励及其微观经济效应研究

在本文中，税收激励是一个核心的自变量。税收激励作为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经历了从传统税收优惠到战略性政策工具的演变过程。早期文献多将其定义为政府通过税收制度的特殊安排，引导纳税人经济行为偏离市场自发轨道（Musgrave，1959），这种狭义界定将税收激励视为市场失灵的矫正手段。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OECD 在 2024 年《税收政策评估指南》中将其重新定义为通过税制设计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强调其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战略属性。因此，税收激励的概念已从早期狭隘的税收优惠发展为融合经济学、公共管理和制度分析的多维政策理念，其定义演变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深化，以及税收政策在国家战略中角色的不断提升。

（一）税收激励概念及要素偏向型分类

（1）税收激励概念界定

本文将税收激励界定为，国家为引导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激励特定经济活动，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制定的、旨在直接或间接降低企业总体税收负担的政策措施的总称。其本质是政府通过让渡部分税收收入，改变企业进行特定投资或经营活动的相对价格与预期收益，从而对其决策行为产生引导作用的政策工具。采用广义的定义使得本文能够更全面、更系统地考察税收政策环境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综合影响。它不仅关注与创新直接相关的税收激励，也关注那些通过改善企业整体经营状况和现金流的政策措施，如优惠税率、税额抵免等能够间接为持续性创新提供资金的政策措施。考虑到管理层通常是基于整体税负和财务规划来决定创新资源分配，而非仅考虑某一项政策影响，因此这一广义视角更符合企业决策的现实。

税收激励政策是国家进行逆周期调控的财政手段，也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刺激实体投资的主要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通过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刺激经济增长，增强经济活力。现有关于税收激励政策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税收激励政策整体激励程度为核心内容，不涉及对某个税种的分析。另

外一类是是针对特殊种类或者具体某一种税收激励政策考察其经济效应，例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等具体激励政策展开研究。

（2）税收激励要素偏向型分类：资本偏向与劳动偏向

在系统梳理税收激励相关研究基础上，为更精准揭示税收激励影响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内在机制，本文依据税收激励作用于生产要素的偏向性差异，将其划分为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与劳动偏向型税收激励。这一分类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政策基础如下。从理论层面看，新古典投资理论与生产要素价格理论表明，税收政策能够通过改变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使用成本，引导企业调整要素投入结构与投资决策（Jorgenson, 1963; House & Shapiro, 2008）。同时，资本—技能互补假说指出，资本投入与技能劳动之间存在显著互补关系，针对不同要素实施的税收激励会产生差异化的激励效果（Acemoglu, 2002; 刘啟仁和赵灿, 2020）。从政策实践层面看，中国支持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同时覆盖物质资本、固定资产、技术装备等资本要素，以及职工培训、研发人员、人力资本积累等劳动要素，呈现出清晰的要素偏向特征（彭飞等, 2022; 赵灿和刘啟仁, 2022）。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依据，本文将税收激励明确划分为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和劳动偏向型税收激励两类，从而为后文实证分析提供统一的概念前提与分类基础。

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是针对物质资本、固定资产、研发设备等资本类要素实施的税收优惠安排，通过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加速折旧、加计扣除等方式，激励企业扩大资本投入与设备更新。其典型政策包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研发设备器具一次性税前扣除、软件及固定资产加速摊销等。该类税收激励的核心特征体现为，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有形与无形资本品为作用对象；传导路径表现为通过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创新硬件条件；效应体现为直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相对间接。

劳动偏向型税收激励是针对人力资本、职工教育、研发人员薪酬、技能培训等劳动类要素实施的税收优惠安排，通过税前扣除、加计扣除、递延纳税等方式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其典型政策包括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研发人员薪酬加计扣除、科技人员股权奖励递延纳税等。该类税收激励的核心特征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以研发人员、技能劳动力、职工培训等人力资本要素为作用对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创新要素结构，进而提高创新转化效率的路径发挥作用；主要效应体现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提升，作用更直接。

资本偏向型与劳动偏向型税收激励存在多维度的显著区别。二者激励要素不同，前者针对资本与固定资产，后者针对劳动与人力资本；政策工具不同，前者以加速折旧、设备类扣除为主，后者以教育经费扣除、薪酬类扣除为主；传导路径也有所差异不同，前者通过扩大投资、缓解融资约束发挥作用，后者通过提升技能、优化人才结构发挥作用；创新效应不同，前者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更为直接，后者则可直接作用于投入与产出。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两类税收激励仍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二者政策目标一致，均以矫正创新外部性、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激励企业持续性创新为核心导向；二者呈现协同互补关系，资本投入需要技能劳动有效匹配，劳动效率提升需要资本设备提供支撑，二者共同形成技能与资本互补效应。另外，现有文献尚未从资本偏向型与劳动偏向型双重视角系统比较税收激励对持续性创新的差异效应，本文的分类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为后文揭示不同政策工具的异质性效应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税收激励的微观经济效应

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力度大、针对性强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不可忽视。既有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就业、企业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等视角探讨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1）税收激励与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税收激励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是多方位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的雇佣规模，对雇佣结构和质量的研究稍有不足。曾艺等（2023）通过构建供应商财务数据库，从供应链溢出效应的角度分析了税收激励对就业的促进作用。研究指出，降低中游企业的税率能够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就业增长，且这一溢出效应在上游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其关键作用渠道包括商业信贷关联和产需行为。刘贯春等（2023）通过分析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的就业效应进行考察，发现该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能够有效提升企业雇佣规模。

（2）税收激励对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

多数研究认为，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例如，闫坤和唐丹彤（2023）以微观层面的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减税降费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税费负担的减轻有利于企业通过提高内源融资能力、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市场投资者信心和关注程度这些渠道增加资本供给，促使企业增加投资。闫浩等（2023）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对增值税税率下调与民营企业投资

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税率降低显著推动了民营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

(3) 税收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具体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但税收激励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田磊和陆雪琴(2021)将企业进入退出机制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减税降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得出减税与降费均可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减税不利于企业优胜劣汰,而降费有利于活跃企业动态。孙鹏和刘湘粤(2024)依托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得出减税与降费均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降费的促进效果要优于减税效果。综上所述,税收激励政策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投资活动、激发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内在活力,然而,这些效应也受到企业规模和行业特性等因素的影响。但也有研究指出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给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而财政压力会通过企业税费负担上升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余靖雯,2022)。

(4)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政策效用是学者研究的焦点,学术界针对政策的整体效果展开了大量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也呈现多样化。促进论认为,税收激励能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侯尚法和朱德贵,2023;韩慧媛等,2023;马克和和刘晓梦,2024)。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效应,税收激励政策即税收负担的降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其中对于创新的测度包括创新投入产出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创新效率。例如,马克和和刘晓梦(2024)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税收优惠力度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有利于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董玮等(2024)基于新能源企业的税收优惠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发现税收优惠能够正向激励企业研发支出强度 and 无形资产增量程度,另外利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来验证税收优惠的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研发成本以及提升技术转化水平等作用机制。

另一类观点认为,企业可能为获取税收激励政策而进行策略性创新,导致创新质量不高或不可持续,进而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不显著,甚至具有挤出效应。刘诗源等(2020)以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实证考察了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熟期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则不显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税收激励所带来的企业税收负担的降低只能激励企业进行策略性创新，对于发明专利这类的实质性创新则无激励作用（孔军和原靖换，2021）。杨国超和芮萌（2020）则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这一政策考察其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激励效应和迎合效应，发现这项政策并不会使“伪高新技术企业”（即该公司通过虚增研发支出等手段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增加创新活动，只有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才能受益于此项政策，表现为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的显著增加。

就企业持续性创新而言，系统性的税收激励效应研究仍相对不足，且既有研究在作用方向与传导机制上也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从研究结论来看，部分研究证实税收激励对企业持续性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李香梅等（2025）指出，税收激励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分担创新活动的内在风险，进而显著提升企业持续性创新水平；其机制检验表明，税收激励主要通过风险承担路径发挥作用，且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会与税收激励形成交互效应，共同调节政策的创新赋能效果。但另一部分研究则对税收激励的长期持续性效果持审慎态度。韩凤芹等（2020）聚焦选择性税收激励的长期动态影响，以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例展开分析，发现税收激励虽能在短期内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扩张与创新产出增加，但其促进作用仅在短期显著，不具备驱动长期持续性创新的稳定效应。更为关键的是，税收激励在政策设计、执行与传导链条中可能存在内在的要素偏向与效果扭曲，进而对创新持续性产生潜在抑制作用。现有政策的结构性偏向可能在无形中强化在位企业的垄断优势，抬高中小企业与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门槛，长期内反而削弱市场整体创新活力与动态竞争水平，这一机制对强调连续投入、稳定迭代的企业持续性创新构成严峻挑战（韩凤芹等，2020）。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初步探讨了税收激励与持续性创新的关系，但尚未形成统一分析框架，在政策效应、作用机制、要素偏向差异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同时，多数研究仍将税收激励视为整体政策变量，缺乏从分类视角对不同政策工具的持续性创新效应进行系统比较，也较少结合数字化转型等企业战略行为揭示其中介传导路径，这构成本文后续研究的重要立足点与拓展方向。

（5）税收激励影响创新的机理相关研究

在现有研究已确立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关联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其

内在作用机理成为深化理论认知的关键。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成本、收益与风险三个核心维度构建了系统的机制分析框架,阐释税收政策通过微观传导路径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具体过程。下文将分别从研发成本降低、预期收益提升与创新风险缓释三个维度,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首先,税收激励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较高的税收负担会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的资本使用成本,从而抑制其研发投入规模。这一机制可以通过新古典投资理论得到解释,税收通过影响资本使用者成本,改变企业创新投资决策(Jorgenson, 1963)。当企业的税收负担加重时,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税后预期收益下降,导致部分边际项目失去经济可行性。另外,对于正处于技术引进与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型阶段的企业而言,其创新活动往往面临双重成本压力,既要承担先进技术引进的高昂支出,又需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张晖明等, 2017)。这种转型期的特殊成本结构使得企业在创新投入上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也更容易受到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税收激励政策通过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有助于增强其内部资金积累能力,为跨越创新转型的成本门槛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持。根据融资优序理论(Myers and Majluf, 1984),企业内部资金是研发投资的首选融资来源。税收激励通过增加企业留存收益,有助于直接缓解研发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或信贷紧缩时期,这种内部资金的积累对于维持企业研发投入的连续性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税收激励政策可以降低企业创新投资风险。创新活动因其高度不确定性(Knight, 1921)与技术、市场及政策等多重风险(Eberhart et al., 2008),常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Hall, 2002)。创新风险主要来自技术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失败可能(Manso, 2011),以及创新融资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风险收益失衡(Akerlof, 1970; Stiglitz and Weiss, 1981)。税收激励能够在多个维度上帮助企业缓解上述风险。一是在技术风险层面,税收激励政策通过税基减免能够实现政府与企业间的风险分担,平滑研发现金流波动,增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财务韧性(Bloom et al., 2002; 李维安等, 2016)。二是在融资风险层面,税收激励政策具备信号传递功能,通过官方资质认证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Spence, 1973; 刘放等, 2016)。税收激励还可通过优化债务结构、增加长期贷款来匹配创新资金需求(王满四等, 2023)。此外,税收激励具有动态强化效应,政策支持降低风险、提升创新成功率,进而激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Aghion et al., 2015)。也就是说,税收激

励不仅直接分担研发风险、改善融资约束，还通过信号机制与动态循环，系统性地提升企业创新意愿与能力，为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再次，税收激励政策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创新预期收益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根据新古典投资理论，企业创新决策基于税后投资回报率评估（Jorgenson, 1963），而创新成果的正外部性导致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形成市场失灵（Mansfield, 1986）。税收政策通过调节企业利润分配，直接影响创新预期收益率与再投资能力（张晖明等，2017）。税收激励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提升创新收益，一是直接提高税后利润率，税基式和税率式的税收激励政策能够降低企业有效税率提高创新项目的净现值，从而补偿创新活动的时间成本与风险溢价（Klassen et al., 2004）；二是信号传递效应，即税收优惠资格向市场传递积极信息，改善外部投资者对项目收益与风险的评估，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可得性（Hall and Van, 2000）。从动态角度看，持续享受税收优惠有助于企业建立创新管理体系，形成创新与收益的良性循环，进而提升创新质量、缩短周期（Bloom et al., 2002）。

最后，税收激励还能够帮助企业积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与结构失衡是制约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关键瓶颈。由于专用性技能投资具有回报周期长、外溢性强等特征，企业难以完全占有培训带来的全部收益，同时面临因创新方向调整所导致的沉没风险，这使得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上趋于保守，整体投入长期低于社会合意水平（Becker, 1962；Acemoglu, 1997；刘啟仁和黄建忠，2018）。而税收激励政策能够通过多重机制缓解这一问题，其一，职工教育经费加计扣除等政策可直接补偿企业培训成本，内部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降低因人才流动带来的潜在损失，从而提升企业投资意愿（曹越等，2021）。其二，当企业面临现金流约束时，此类软性投资往往被优先削减。税收激励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缓解资金压力，促使资源向人才培养倾斜（李戎等，2025；李逸飞，2023）。尤其是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等重点对象的培训税收激励措施，还具有信号传递功能，能够向市场传递企业注重长期能力建设的积极信号，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获取稳定长期融资的能力（叶永卫等，2023），从而为持续性的人力资本积累与结构升级提供制度与财务支持。

（三）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的微观经济效应

从作用机制来看，税收激励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影响企业研发决策。这一效应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边际成本调节效应。企业研发活动通常面临边际成

本递增的约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其边际成本逐步上升，直至达到企业可承受的临界水平（David et al., 2000）。这一现象源于研发活动的特殊性，随着研发深度的推进和技术难度的增加，所需投入的专业化设备和高端人才成本也相应提高。税收优惠通过降低研发支出的实际成本，有效减缓边际成本上升的速度，在未产生挤出效应的前提下，拓展企业研发投入的可行边界（Hall and Van, 2000）。

其次是要素替代效应。政策通过降低研发相关的要素投入价格，引导企业以创新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进而推动技术结构升级与产业价值率提升（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例如，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政策的核心是资本要素，它旨在降低资本要素的税收成本而对劳动要素的税收成本不产生影响（彭飞等，2022），通过降低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要素的购买成本，促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增加资本投资，调整企业的投资结构（Bai and Wu, 2022）。2014-2019 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2-2016 年实施的“营改增”政策就是典型的具有资本偏向型特征的税收激励政策（彭飞，2022；赵灿和刘啟仁，2022；时省等，2023）。相对应的，劳动偏向型税收激励政策是指以劳动要素为核心，旨在降低劳动要素价格，促进企业增加雇佣，扩大就业的财政政策（Yang and Zhang, 2021），比如 2018 年的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2019 年的社会保险费率降低方案等。这种相对价格变化不仅激发企业参与创新的意愿，也强化了政策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功能。现有的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政策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营改增等，相关研究文献也围绕这些政策，探讨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多采用局部地区或者行业试点的形式展开，因此可以将这些政策看成一次准自然实验，研究方法也以差分模型为主要研究模式。

（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

相较于其他总括性的政策措施，如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被视为一种资本偏向型的减税策略（李建强和赵西亮，2021）。此政策通过提前进行折旧抵扣，有效提升了企业在投资初期的税收减免力度，从而减缓了资金的外流速度，让企业能够更快地回收投资资本。这实际上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一笔无需支付利息的“无息贷款”（赵灿和刘啟仁，2021），并赋予了企业额外的时间价值，进而减少了其资本成本。刘行等（2019）的研究显示，对于期限为 1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加速折旧与直线法折旧所带来的现值差异约占投资总额的 1.5%。张克中等（2021）则发现，该政策可以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从而增加公司税后利润。赵灿和刘啟仁（2022）以 2014 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例采

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资本偏向型减税降费对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他们分析出减税降费有利于企业在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缩小资本边际产出价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从而提升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他们指出该政策在融资约束较高、固定资产净值率较低、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高以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现有文献关于该政策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企业投资、就业、企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价值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首先，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这一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减税降费政策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在微观企业中的反映。加速折旧政策对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激励效应，已经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验证。House 和 Shapiro（2008）、Zwick 和 Mahon（2017）均以美国 2000 年初实施的折旧补贴政策为切入点，探究了加速折旧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中，House 和 Shapiro（2008）发现，短期的所得税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如购置固定资产等资本类投资，但对产品价格则没有显著影响。而 Chen 和 Dauchy（2010）则进一步对加速折旧政策的作用边界进行探究，具体而言，与大型企业相比，小型企业对奖励折旧政策的投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在能够在当期进行投资抵扣激励的企业（即应纳税额大于零的企业）所受到的投资激励影响要明显高于那些需要等到后期才能拿到抵扣激励的企业（即应纳税额小于等于零的企业）。另外，Kim（2020）、Koshembar（2008）分别基于韩国太阳能行业数据、乌克兰数据证实加速折旧政策对于企业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国内多数关于该政策的效果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该政策对企业投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例如，刘啟仁等（2019）以 2014 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得出该政策具有显著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效应，其作用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该项政策存在无息贷款效应有利于改善企业现金流，二是自购更多代替租赁所带来的替代租赁效应。刘行等（2019）在得出该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结论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小规模以及非国有企业等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中效果更为显著。赵德昭等（2023）认为该政策对盈利企业、税率高的企业等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投资激励效果。上述文献关于加速折旧政策综合激励效应的探讨基本上得出一致的结论：该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投资，但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所得出的结论略有差异，差异化效应的研究能够为客

观全面的评价该政策提供更多视角。

其次，劳动力与固定资产之间存在着互补性，故而，实施加速折旧政策在激励实业投资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劳动力的雇佣规模、素质以及收入水平产生相应的影响。就劳动力的雇佣规模而言，鉴于工人技能水平的参差不齐，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力雇佣数量的影响会呈现出差异性。刘啟仁和赵灿（2020）的研究基于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假说展开，将加速折旧政策效果的评估从固定资产投资扩充到人力资本投资领域，他们利用上市公司雇佣结构详细分类数据进行回归得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要高于技能劳动力的增长率，这会增加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肖人瑞等（2021）进一步探讨了加速折旧政策的就业效应，根据回归结果得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的职工雇佣规模，这主要得益于该政策的产出效应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要大于替代效应造成的劳动力需求减少。

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该政策对企业总体雇佣规模没有显著影响或者是降低了整体的就业水平（徐丹丹等，2021）。同时，该政策对提高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的结论也并不一致，例如，肖人瑞等（2021）认为该政策对提高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没有明显作用，而潘妍等（2023）发现该政策在增加了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同时提高制造业劳动力质量，该文献用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质量的代理变量；徐丹丹等（2021）认为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提高了上市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这一效应是职工平均薪酬的提高和就业水平的降低引发的。进一步地，有学者就该政策与企业内部收入结构的变化展开了研究。张克中（2021）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证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管理层平均工资的提升作用要大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水平的上调幅度，因此该政策会显著扩大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因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呈现出结构复杂性与效应异质性，其在促进人力资本升级与扩大就业规模的同时，亦可能引致工资结构分化、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乃至就业稳定性变化，其净效应取决于政策传导路径、企业要素配置策略以及外部市场条件的交互作用。

再次，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集中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以及产出质量等方面。由于资金约束是限制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投资的重要因素，所以加速折旧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资金约束，尤其是提高企业内源融资能力从而促进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有利于增加创新产出数量和提升创新产出质量。赵灿等（2022）从风险承担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促进企

业进行研发创新，认为加速折旧政策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的表现一是增加资本投资，二是提升研发创新投资水平，尤其是高质量的研发创新投资。林志帆和刘诗源（2022）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创新数量以及提高创新质量，其中，民营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研发创新因为该政策所获得的收益更大。谢谦等（2024）在采用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数据集研究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时，发现研发投入增加和研发团队结构的优化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但也有研究认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处于特定时期的企业创新投入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刘诗源等（2020）认为该政策仅能促进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投入强度，对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部分学者对该政策效应持否定看法。例如刘伟江和吕镛（2018）基于 2011-2016 年中国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指出，加速折旧政策并未能推动静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未能明显提升企业的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他们认为该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缺乏激励作用。同样，熊波和杜佳琪（2020）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加速折旧政策会促进企业加大投资，投资效率却随之降低，从而不利于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且指出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市场发达地区企业受政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更为明显。但最近也有研究通过限定行业范围得出肯定结论，赵旭杰等（2022）基于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据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出该政策通过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且该提升作用对民营企业、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效果更为显著。

最后，基于加速折旧的投资激励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等。例如，王晖和谢申祥（2024）在探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时，其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又一次印证了前人文献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增加投资和促进创新的结论，他们指出该政策一是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提高实体投资占比，二是促进企业提高创新投入、产出以及创新效率来拉动企业价值增值；同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股权结构以及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另外，现有研究认为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研发

投入、人力资源投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优化市场预期等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曹直和吴非，2023；赵扬和李长英 2024）。由此可见，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但该种类型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尚未见到文献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2）营改增及其微观经济效应相关研究

在微观层面，营改增的政策效应体现在企业提升了现金持有水平，促进了企业在固定资产、劳动雇佣、原材料采购等方面的投资（袁从帅等，2015；李成和张玉霞，2015；郭界秀，2024），激发了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邹洋等，2019；毛捷等，2020；李艳艳等，2020；袁建国等，2018；王珮等，2019），提升了企业绩效（王玉兰和李雅坤，2014；刘建民等，2017；惠丽丽和谢获宝，2017）。例如，曹越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这一税收改革显著增加了试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证明该政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毛捷（2020）发现营改增政策成功地降低了试点企业的流转税税负，并由此优化了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李卫兵和王利霞（2021）关注营改增后企业的经营性投资行为，认为营改增政策刺激企业进行经营性投资，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王瑶等（2022）基于 2012-2017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虽然有助于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专利产出并未同步增加，导致企业创新效率下降。惠宁和杨金璇（2024）指出不同于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直接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服务业营改增政策通过降低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间接达到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

（四）劳动偏向型税收激励微观经济效应

（1）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

关于职工教育经费的研究主要围绕该政策对人力资本投入、就业以及员工工资水平和结构等的影响展开。首先，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企业在职培训投入（曹越等，2021）。促进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是稳定制造业就业的关键所在，其中，增加职工教育经费支出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增加企业人员雇佣（叶永卫等，2023）。而且其中高素质职工雇佣规模会有显著增加，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其次，现有文献对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是否会造成员工工资下降存在

不一样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企业加大了在职职工培训力度，会转嫁部分成本给职工，所以该政策会降低员工工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效应要大于给员工的工资支付，因此不会降低员工工资水平。进一步地，有学者分别就不同类型的员工研究该政策对其工资的影响。例如，刘雅南等（2023）认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使得普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而高管平均工资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从而显著改善了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情况，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行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效果更为显著；该政策能够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该政策提升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支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以及降低员工离职率。

此外，就该政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方面，叶永卫等（2023）基于 2018 年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这一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政策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得出该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增加专利产出；另外，该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税费负担较高以及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中效果更为凸显。

（2）降低社保缴费负担相关政策

社保缴费负担变化的直接作用一是体现在供给侧方面，主要是对企业社保缴费水平、就业水平以及结构的影响。宋弘等（2021）基于浙江省各地区 2012 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这一准自然实验，依托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得出社保缴费率下降能够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保参与和社保缴费总支出，同时显著增加了企业劳动力雇佣水，并且这些政策效果在中小民营企业更为凸显；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保缴费率下降在不影响企业总薪酬支出的前提下显著降低了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企业平均用工成本，对此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缴费率下降带来的就业增加可能主要源于低技能员工雇佣规模扩大，存在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可能。二是社保减负效果体现在需求侧方面，主要是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徐舒等（2024）基于微观家庭数据提出企业社保减负通过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机制提升了家庭各个生命周期消费规模，同时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机制是指该政策有利于将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转化为正规部门就业。

而社保缴费负担下降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创新绩效变动等方面，现有研究关于保险缴费负担对创新产出影响的不同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效应，一种观点认为在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成本效应，对于企业

而言,较高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会削减其内部现金流,加剧用于创新支出的资金压力,从而挤出企业创新投入,从而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张玲等,2024)。从员工角度来说,当企业面临较高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时,可能会通过降低员工薪资的方式,将部分缴费成本转嫁给员工来承担(封进,2014)。社会保险缴费会提高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唐珏和封进,2019),因而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以及产出(梁君等,2024)。相对应社保缴费减负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曾益和杨悦,2021;徐舒等,2024),在资本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因此将其归类为劳动偏向型减税降费政策。另外一种观点则主要是认为社保缴费通过激励效应或者是要素替代效应影响企业创新投入,较高的社保缴费负担能够激励员工增加有效劳动供给以及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来代替劳动力要素,从而使得激励企业以技术创新投入替代劳动雇佣(廖湘岳等,2023)。李姝和田马飞(2022)则提出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创新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并提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水平的最优区间,基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社保缴费负担以及社保缴费负担的降低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三、数字化转型及其创新效应研究

(一) 数字化转型概念与测度

(1) 数字化转型概念研究

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信息化研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其概念内涵经历了三次重要跃迁。第一阶段(1990-2000 年)以“数码化”为核心特征,主要解决模拟信息的数字编码问题,如图书馆文献数字化、影像资料数字化存储等。第二阶段(2000-2010 年)进入“数字化”阶段,企业开始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业务流程改造,典型表现为 ERP 系统实施、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第三阶段(2010 年至今)则进入“数字化转型”深度发展期,其标志性特征是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Verhoef et al. (2021)提出的三阶段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研究通过对全球 432 家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87%的数字化转型成功企业都遵循了由数码化到数字化再到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路径。其中,数码化阶段主要实现信息载体的标准化处理,数字化阶段侧重业务流程的智能化改造,而转型阶段则致力于构建数据驱动的价值网络。

数字化转型作为当代企业战略变革的核心议题,其概念内涵在学界存在多元

解读。Stolterman 和 Fors（2004）的奠基性研究最早从社会技术系统视角提出，数字化转型本质是数字技术引致的人类生活全域变革，这一界定突出了数字技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广泛渗透性。随着研究的深入，Westerman et al.（2011）将关注点转向企业微观层面，将其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企业绩效与运营范围的本质性提升，强调技术应用与组织效能的正向关联。在理论发展过程中，Mazzone（2014）、Dörner 和 Edelman（2015）的研究实现了重要突破。他们突破技术决定论局限，提出战略驱动说，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价值创造体系的重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战略范式的根本转变。这一观点在 Hess et al.（2016）的研究中得到深化，他们系统论证了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涉及技术架构、价值网络、组织形态和财务模型四个维度的协同变革，与 Verhoef et al.（2021）提出的战略转型论形成理论呼应。中国学者黄丽华等（2021）的整合性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基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演进逻辑，他们提出数字化转型是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的融合应用，触发组织深层变革的系统工程。该定义不仅涵盖技术基础层（ICT 基础设施）、业务重构层（组织行为变革），更延伸至生态网络层（产业协同创新），构建了多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马君和郭明杰（2023）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改变实体属性的过程，是由信息系统驱动的企业变革，包括业务流程改进、组织结构变革、商业模式创新等，同时重塑企业战略、文化和愿景。从理论演进脉络来看，数字化转型研究呈现三个显著特征：其一，研究视角从宏观社会影响（Stolterman and Fors, 2004）向微观企业价值（Westerman et al., 2011）再向战略生态系统（黄丽华等, 2021）不断深化；其二，认知维度从技术工具论向战略变革论持续拓展；其三，研究方法从单一案例研究向多学科理论整合发展。这种演进轨迹反映了数字化转型理论正从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从局部观察到系统建构的学术成熟过程。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当前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内涵仍存在显著分歧（Schallmo et al., 2017; Hilali and Manouar, 2019），但已有研究形成若干关键共识，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驱动企业在战略层面实现价值创造体系重构、组织结构优化和运营模式创新的系统性变革过程（Henriette et al., 2015; Hilali et al., 2020; Ghosh et al., 2022）。这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应用范畴，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设施，通过战略性的组织能力重构，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生态化转型与价值网络的协同进化。作为本文的核心机制变

量，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界定为企业以前沿数字技术为依托，从根本上重构其价值创造模式、核心业务流程、产品与服务结构以及组织架构的战略性、系统性变革过程。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或单纯技术工具应用，其核心特征在于将数据作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数据驱动决策和数字技术赋能双轮联动，实现企业运营效率优化、价值链协同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突破。数字化转型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采纳与融合，更关乎组织认知、文化结构和资源分配机制的深层转变，是一项涵盖技术、组织与战略的多维度的复杂演进过程。

（2）数字化转型测度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测度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数字化转型并非单一的技术升级过程，而是涉及技术应用、业务流程、组织架构乃至企业战略的系统性变革，这种复杂性使得如何科学有效地衡量其发展水平成为重要研究难题。准确的测度不仅是评估转型效果的基础，也是识别其经济影响、传导机制与政策效应的前提。迄今为止，数字化转型测度方法经历了从单一技术指标到多维综合体系的演进过程。

早期研究主要依赖信息通信技术（ICT）投入指标，如计算机数量、服务器密度与互联网带宽等（Bresnahan et al., 2002）。这类指标易于获取、客观性较强，但仅能反映技术投入规模，无法揭示技术如何嵌入业务流程并驱动价值创造，难以全面捕捉转型的实际深度与广度。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测度思路逐渐从基础设施投入转向数字化应用水平。学者们开始采用 ERP、CRM、SCM 等关键信息系统的部署情况衡量数字化程度，通常使用问卷调查构建二元虚拟变量。尽管该方法更贴近企业实际运营场景，但其仍难以衡量技术应用成熟度、系统集成水平以及商业模式重构的战略价值，仍存在一定片面性。

当前研究普遍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多维度、动态性的系统工程，测度方法也相应转向多维综合评价体系。这类体系通常涵盖技术基础、业务应用、组织支持与融合创新等层面：技术基础层关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的应用深度；业务应用层侧重研发、生产、营销、物流等关键环节的数字化改造程度；融合创新层强调数据驱动决策水平与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组织支持层则包括数字战略、数字人才、组织敏捷性与数字文化等软性条件。综合评价多采用权威问卷或自编量表，借助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合成指数，实现对转型水平的系统性度量，显著提升了测度的科学性与解释力。总体而言，依据数据来源与方法论差异，现有数字化转型测度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典型范式。

一是基于关键节点的单一指标测度法。该方法选取数字化转型的代表性关键节点作为代理变量，具有数据易得、操作简便的优势。现有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选取代理指标：硬件投入方面，刘政等（2020）采用企业信息技术软硬件投资规模；无形资产方面，祁怀锦等（2020）使用无形资产中数字化软件、平台等占比；组织变革方面，范合君等（2023）以企业是否设立首席信息官、首席数据官作为衡量标准；战略行为方面，唐浩丹等（2022）以数字化并购、张鹏杨等（2023）以跨境电商平台入驻、刘诚等（2023）以上行线上平台接入刻画转型进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学者根据研究视角的差异选择了不同的代理指标：但由于数字化转型具有多维属性，仅依靠单一指标容易出现测度偏误，难以反映其完整内涵。

二是强调系统性的综合指标评估法。为克服单一指标的局限，学者们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评价体系。万伦等（2020）从价值创造、能力建设与要素配置三个维度构建框架；赵聪慧和范合君（2023）从意识、能力与绩效层面建立三位一体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与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蒋鑫和周轩（2024）则从战略定位、文化氛围、组织结构与技术应用构建成熟度模型。综合指标法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数字化转型特征，但指标体系设计主观性较强，数据获取成本较高，在大样本实证研究中应用受限。

三是基于产业关联的投入产出分析法。该方法从宏观视角出发，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数字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渗透与关联效应。王贵铎等（2021）以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对各产业的中间投入比例衡量产业数字化规模；杨飞（2022）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以数字产业中间投入占行业增加值比重测度数字化程度；梁昊光和秦清华（2023）基于投入产出结构测算数字经济产业渗透度，并进一步推演企业层面转型水平。该方法能够揭示数字化的宏观经济效应与产业联动机制，但难以识别企业异质性，且数据更新周期较长，对快速变化的转型实践反映滞后。

四是依托大数据技术的文本分析测度法。该方法已成为当前大样本文的主流范式。其核心思路是构建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库，利用文本挖掘工具对上市公司年报、公告等公开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实现对转型程度的量化识别。何帆和刘红霞（2019）基于公告信息识别数字化转型企业；吴非等（2021）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维度构建词频指标；赵宸宇等（2021）从技术应用、商业模式、智能制造、信息系统四个维度提取关键词并合成指数；袁淳等（2021）则基于国家数字经济政策构建权威词典，提升指标的规范性与系统性。文本分析法具有数据可得性强、测度客观、适合大样本研究等优势，其有效性依赖于词库构

建的科学性，同时需警惕企业“概念炒作”带来的测量偏差。

通过上述梳理可见，四类测度方法各具优势与局限，适用于不同研究场景与研究目标。其中，文本分析法因兼具客观性、可扩展性与大样本适用性，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实证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同时，多源数据融合与多方法互补将成为未来测度研究的重要趋势。立足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属性，为实现客观、可量化的测度目标，本文主要借鉴吴非等（2021）的文本分析方法，通过挖掘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数字化转型相关表述并进行词频统计，构建多维度数字化转型指数。该指数涵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化业务模式、智能制造、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内容，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将抽象战略转化为可比较、可检验的量化指标，为后续检验数字化转型在税收激励与企业持续性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提供基础。

（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受到内部组织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内部因素方面，领导力要素被证实是核心驱动力。Westerman et al.（2011）强调高管团队的战略领导力比技术选择更能决定转型成效；在 Li et al.（2018）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企业家能力与数字化转型成效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资源分配策略会产生调节效应。任晓怡等（2022）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会通过资源挤占机制抑制数字化转型投入。同时有一些研究指出哪些内部因素会阻碍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张克群等（2025）则认为企业拥有的实物资源水平较高的话会增加企业的融资负担与企业惯性，进而会对企业数字化进程产生抑制作用。

在外部环境因素维度，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构成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政府对企业的政策干预等。史宇鹏和王阳（2022）证实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广度与深度；曹直和吴非（2023）与刘明慧等（2025）则分别验证了政府数字化补贴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激励的政策激励效应。此外，李鑫等（2025）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表明，作为区域创新网络形式出现的长三角“科创走廊”建设，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双重路径促进数字化转型。这些研究发现共同揭示了内外部因素的协同作用机制。

（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不仅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产出数量的作用，还深入探讨了创新效率、创新质量等多维创新绩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从影响机制、非线性关系、结构性变革以及持续性创新等视角，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复杂影响。

现有研究普遍关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产出、创新效率与创新质量的综合作用。夏芸等（2025）以《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收入渠道和优化运营成本双重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研发创新投入。李天建等（2025）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供应链层面，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商业信贷与知识溢出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创新。李晓蓉等（2025）借发明专利授权量表表征企业创新产出效率与质量，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并揭示机会感知、学习吸收、资源重构等动态能力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

在研究结论上，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多数研究支持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也有文献提出不同观点。例如，张国胜和杜鹏飞（2022）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分类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仅提升了技术创新数量，对创新质量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同时，积极影响层面的研究又可进一步分为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两类。

一类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线性促进作用，并从多重路径展开解释。第一，数字化转型优化创新流程、提升研发效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与分析（Andries et al., 2013），推动跨部门协同（王文娜等，2020）与知识网络构建（Wei et al., 2021），进而缩短研发周期、降低创新风险。冀云阳等（2023）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利润保障效应、成本控制效应提升研发投入，并借助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提高研发效率，形成从投入到产出的良性循环。第二，数字化转型降低创新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为创新提供资源支撑。朱浩等（2025）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强外部监督，缓解信息不对称并抑制研发操纵，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庞瑞芝等（2023）指出，数字化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促进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马丽仪等（2024）将研究拓展至中小企业，发现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专利产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丰富了研究的适用场景。

第三，数字化转型拓展创新模式、推动开放式创新。毛荐其等（2023）基于电子设备制造业数据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知识整合能力，同时促进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持续性，推动企业突破组织边界、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创新模式变革。

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苗宏慧等（2024）、徐辉等（2024）的研究均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或创新效率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在转型初期，数字化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创新流程；但随着转型深度不断增加，可能因信息过载、组织适配不足等问题导致边际效应递减，甚至产生抑制作用。徐辉等（2024）基于门槛模型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尚未跨过门槛值，仍处于正向促进区间。与之不同，马君和郭明杰（2023）提出正 U 型关系：转型初期因组织阵痛、资源重构可能短期抑制创新，但随着转型深化，正向效应逐步释放并显著提升创新绩效。上述分歧体现了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复杂性与情境依赖性，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

除直接影响外，数字化转型还通过驱动结构性变革重塑企业创新生态，主要体现在商业模式重构、组织架构演进与生产系统升级三个维度。在商业模式层面，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价值创造逻辑，推动企业从产品交付向数据驱动的服务生态转型。罗珉和李亮宇（2015）、肖静华等（2020）指出，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了消费者交互方式，使渠道成为数据流与服务流的整合载体，为创新提供了新的价值空间。在组织架构层面，科层制组织逐步向平台化、网络化架构演进。谢康等（2020）认为，新型组织模式通过分布式决策与弹性协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创新提供灵活的组织保障。在生产系统层面，智能制造推动生产要素数字化重组，实现智能化、模块化与柔性化生产。Tian et al.（2002）、戚聿东和肖旭（2020）、谢康等（2021）的研究表明，生产系统升级不仅提高运营效率，也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适配的硬件基础。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凌士显和张晓玉（2024）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研发投入激励、高端人才吸引与协同创新强化三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崔丽等（2024）进一步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创新持续性，而持续性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呈 U 型关系，且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四、文献评述

既有文献已分别对持续性创新的内涵、测度与影响因素，税收激励的微观经济效应与创新效应，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测度方法、驱动因素及其创新影响展开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参考。与此同时，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明显不足，也构成了本文重要的研究空间与边际贡献。第一，在持续性创新研究中，多数文献将政策环境视为一般性外部影响因素，侧重直接检验其效应，较少打开“政策-内部战略-创新持续性”的传导机制，对政策如何通过改变企业战略选择、进而长期塑造创新持续性的内在路径缺乏深入阐释。第二，在税收激励与创新的研究中，尽管已形成促进论与策略性创新论等不同观点，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直接效应检验，将企业视为“黑箱”，较少关注税收激励如何通过释放资源与信号功能，驱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这类深层次、长期性战略变革，并由此间接影响创新持续性。相关研究对税收激励的长期动态效应、机制路径与异质性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深化。第三，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研究中，现有成果多单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或将其作为营商环境、高管特征等因素的结果变量，较少将其置于统一的政策分析框架内，系统识别其在“政策冲击-战略调整-能力提升-持续创新”链条中的中介桥梁作用。尤其对于“税收激励是否及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支撑持续性创新”这一核心逻辑链条，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 [1]曹直,吴非.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8(02): 88-99.
- [2]崔丽,盖舒晴,张振铎,等.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持续性与创新绩效[J]. 管理科学, 2024, 37(02): 21-37.
- [3]杜金柱,扈文秀.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03): 21-26.
- [4]段海艳.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 34(15): 87-93.
- [5]樊霞,陈娅,张巧玲.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创新持续性[J]. 管理学报, 2020, 17(09): 1347-1354.
- [6]韩凤芹,陈亚平,田辉. 税收选择性激励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分析——基于政企策略性反应视角[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1(11): 125-

- [7]何熙琼,杨昌安. 中国企业的创新持续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成本性态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9, 40(05): 105-121.
- [8]贺小刚,陈元,杨婵,等. 持续创新对困境企业复苏的影响机理研究[J]. 科研管理, 2023, 44(12): 146-157.
- [9]何郁冰,张思. 技术创新持续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17, 38(09): 1-11.
- [10]何郁冰,周慧,丁佳敏. 技术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持续创新?[J]. 科学学研究, 2017, 35(12): 1896-1909.
- [11]侯林岐,蔡书凯,马卫刚,等. 政府绿色采购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5, 42(04): 110-120.
- [12]胡冰,戚聿东. 数字金融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动态影响——兼论营商环境的作用[J/OL]. 当代财经, 1-16[2025-06-03]. <https://doi.org/10.13676/j.cnki.cn36-1030/f.20250522.001>.
- [13]贾建林,樊霞. 研发区域边界拓展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持续性[J]. 中国科技论坛, 2020(03): 54-63.
- [14]孔军,原靖换. “减税降费”下上市企业税负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1(S1): 268-276.
- [15]旷锦云,程启智.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可持续发展[J]. 经济问题探索, 2010(10): 80-85.
- [16]乐怡婷,李慧慧,李健. 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兼论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 34(02): 139-146.
- [17]李德辉,潘丽君. 海归劣势、持续创新能力与新创科技企业生存: 基于企业事件史的分析[J]. 科研管理, 2022, 43(05): 76-85.
- [18]李健,杨蓓蓓,潘镇. 政府补助、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 中国软科学, 2016(06): 180-192.
- [19]李天建,樊逸男.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路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62(02): 122-133.
- [20]李晓蓉,张津明,刘红琴. 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25, 46(05): 1-12.
- [21]梁阜,邱圆心,李琪. 双元环境下平台型领导如何促进组织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组织韧性的中介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15): 23-31.
- [22]林志帆,刘诗源. 税收负担与企业研发创新——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 2017(02): 98-112.

- [23]刘明慧,何雪婷,冀云阳. 政府数字化补贴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管理层情绪和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J]. 华东经济管理, 2025, 39(07): 61-73.
- [24]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 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J]. 经济研究, 2020, 55(06): 105-121.
- [25]马克和,刘晓梦. 税收优惠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J]. 税务研究, 2024(07): 120-127.
- [26]史宇鹏,王阳,张文韬.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 现状、问题与展望[J]. 经济学家, 2021(12): 90-97.
- [27]孙冰,谭钰皎,杨雪婷. 企业规模与创新持续性——基于“坚柔并济”的双调节作用[J]. 软科学, 2024, 38(09): 101-107+124.
- [28]陶瑞,张俊光,于敏. 企业持续创新的运行机制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06): 73-77.
- [29]万良勇,查媛媛,饶静.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产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 会计研究, 2020(11): 98-111.
- [30]万伦,王顺强,陈希,等.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 40(13): 142-148.
- [31]王晖,谢申祥. 资本偏向型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价值——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01): 165-183.
- [32]王满四,付奕衡,洪馨仪. 减税降费、长期贷款撬动与企业创新[J]. 会计研究, 2023(08): 88-102.
- [33]吴琨,顾阳. 技术联盟内企业持续创新运行机制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 32(21): 1-4.
- [34]夏芸,孙彦冰,刘露薇,等. 开源节流: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J]. 产业经济评论, 2025(05): 159-182.
- [35]向刚. 企业持续创新: 理论研究基础、定义、特性和基本类型[J]. 科学学研究, 2005(01): 134-138.
- [36]向刚,刘昱. 企业持续创新过程形成的基本规律性特征[J]. 经济问题探索, 2005(11): 64-65+93.
- [37]谢谦,毕文静,金才淇.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检验[J]. 南开管理评论, 2025, 28(06): 174-185+197.
- [38]徐炜,张小萱,马树元,等. 国资参股与家族企业创新持续性——家族控制结构异质性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25, 37(07): 127-140.
- [39]许治,陈郑逸帆,朱明晶. 企业持续创新必然促进业绩增长?——基于环境动荡

- 性调节效应的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0, 41(12): 3-19.
- [40]杨国超,芮萌.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J]. 经济研究, 2020, 55(09): 174-191.
- [40]杨茜,赵泉午,王烽权. 众智共融:第三方开放式创新平台动态知识共享推动持续创新的实现机制[J]. 中国软科学, 2025(08): 128-140.
- [42]姚正海,王强. ESG 表现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J]. 软科学, 2025,39(06): 99-108.
- [43]叶云岭,单航,于海潮.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与企业持续创新[J/OL]. 当代财经, 1-15[2025-09-29]. <https://doi.org/10.13676/j.cnki.cn36-1030/f.20250512.002>.
- [44]余芬,樊霞. 高管认知、行业管制与企业创新持续性[J]. 科研管理, 2022, 43(12): 173-181.
- [45]余芬,樊霞,李芷珊. 企业金融化提升创新持续性了吗? ——兼论制度环境的影响[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1, 33(03): 1-13.
- [46]余芬,樊霞,张巧玲. 政府补贴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持续性——基于异质性创新动机视角[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05): 67-78+89.
- [47]曾艺,周小昶,冯晨.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稳就业[J]. 管理世界, 2023,39(07):19-29+45+30-36.
- [48]张国胜,杜鹏飞.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增量还是提质?[J]. 经济管理, 2022, 44(06): 82-96.
- [49]赵灿,刘啟仁. 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是否有助于改善资本要素的错配? ——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微观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22,48(08):109-123.
- [50]赵炎,齐念念,孟庆时. 技术整合能力、绿色专利质量与企业持续性创新[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08): 11-21.
- [51]周路路,李婷婷,李健. 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可持续性的曲线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07): 105-118.
- [52]周涛,宋宇,高洋. 公共数据开放对民营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J/OL]. 华东经济管理, 1-14[2025-10-21]. <https://link.cnki.net/urlid/34.1014.F.20251011.1308.002>.
- [53]周泽将,高雅萍.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与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5, 45(01): 17-35.
- [54] Acemoglu D, Akcigit U, Alp H, et al. 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11): 3450–3491.
- [55] Acemoglu D, Zilibotti F.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2): 563-606.

- [56] Aghion P, Bloom N, Griffith R, et 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2): 701-727.
- [57] Antonelli C. The economics of path-dependence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7, 15(6): 643-675.
- [58] Arnold M. Fostering sustainability by linking co-creation an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oncept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140(Part 1): 179-188.
- [59] Batra S, Sharma S, Dixit M R, Vohra N. Does strategic planning determine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A study of Indian SME sector[J].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43(3): 493-513.
- [60] Bertani F, Ponta L, Raberto M, et al.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angible digital economy: An agent-based model[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9: 527-540.
- [61] Bianchini S, Pellegrino G. Innovation persistence and employment dynamics[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5): 1171-1186.
- [62] Boer H, Gertsen F. From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o continuous innovation: a (retro)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3, 26(8): 805-827.
- [63] Cefis E, Ciccarelli M. Profit differentials and innovation[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 2005, 14(1-2): 43-61.
- [64] Cefis E, Orsenigo L. The persistence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A cross-countries and crosssectors comparative analysis[J]. *Research Policy*, 2001, 30(7): 1139-1158.
- [65] Chowhan J, Pries F, Mann S. Persistent innovation and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work organization, and strateg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17, 23(3): 456-471.
- [66] Clausen T, Pohjola M, Sapprasert K, et 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as a source of persistent innovation[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2, 21(3): 553-585.
- [67] Crépon B, Duguet E. Estimating the innovation function from patent numbers: GMM on count panel data[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997, 12(3): 243-263.
- [68] Diana S.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in unstable environmen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firm's innovative behavior[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4): 726-736.

- [69] Diéguez-Soto J, Duréndez A, García-Pérez-de-Lema D, et al.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and persistent innov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 family firms: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ism[J]. *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 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e l'Administration*, 2016, 33(4): 332-346.
- [70] Flaig G, Stadler M. Success Breeds Success. The Dynamics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4, 19(1): 55-68.
- [71] Fontana R, Vezzulli A.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persistence in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Local Area Network industry 1990–1999[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8): 1604-1619.
- [72] Fu C, Luo D, Zhang J, et al. Tax incentives,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5(97): 1-10.
- [73] Geroski P A, Van Reenen J, Walters C F. How persistently do firms innovate? [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1): 33-48.
- [74]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1): 3-43.
- [75] Guarascio D, Tamagni F.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and patterns of firm growth[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6): 1493-1512.
- [76] Huang C H, Yang C H.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in Taiwan's manufacturing firms[J]. *Taiwan Economic Review*, 2010, 38(2): 199-231.
- [77] Imran F, Shahzad K, Butt A, Kantola J.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Towar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J]. *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 2021, 21(4): 451-479.
- [78] Jorgenson D W. Capit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2): 247-259.
- [79] Leonid K, Dimitris P, Amit S, et 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132(2): 665-712.
- [80] Lhuillery S. Marketing and persistent innovation success[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14, 23(5-6): 517-543.
- [81] Li R, Rao J, Wan L. The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22, 43(7): 2875-2886.
- [82] Liu M, Li C, Wang S,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isk-taking,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data on 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2023, 8(1):1-15.

- [83] Malerba F, Orsenigo L. Technological entry, exit and surviv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atent data. *Research Policy*, 1999, 28(6): 643-660.
- [84] Martini A, Laugen B T, Gastaldi L, et al. Persistent innovation: Towards a paradoxical, ambidextrous combination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3, 61(1): 1-22.
- [85] Nam VH, Bao Tram H.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persistence: The case of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Vietnam[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21, 30(3): 239-61.
- [86] Nonaka I.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 69(6): 96-104.
- [87] 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J]. *Long Range Planning*, 1996, 29(4): 592.
- [88] Parrao A, Reyes T, Cruz A, et al. Firm size relationship with persistent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growth: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2025, 20(7): 3096-3121.
- [89] Peters B.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Stylised facts and panel data evidence[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9, 34: 226-243.
- [90] Rauter R, Globocnik D, Perl-Vorbach E, et al. Open innov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economic and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2019, 4(4): 226-233.
- [91] 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71(3): 393-410.
- [91]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92] Schumpeter J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 [93] Soosay C A, Hyland P W. Effect of firm contingencies on continuous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5, 2(02): 153-169.
- [94] Tavassoli S, Karlsson C. Persistence of various types of innovation analyzed and explained[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10): 1887-1901.

- [95] Triguero A, Corcoles D.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 An analysis of persistence for Spanish manufacturing firms[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2): 340-352.
- [96] Triguero A, Corcoles D, Cuerva M C.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and firm's growth: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SME and large Spanish manufacturing firm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4, 43: 787-804.
- [97]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 509-534.